

高校毕业生“史上最难就业季” 与全球性青年失业问题再探讨

——比较制度框架下的跨国定量研究

苗 国

摘要:本文以全球青年失业现象为研究对象,借助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新公布的权威数据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国家的青年失业现状与各自特征,利用跨国截面数据定量地比较分析影响青年就业的各种因素,并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指出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史上最难就业季”将会由“非常态现象”成为“常态现象”,NEET群体——“既无工作又不在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失业青年”的大量出现,使得青年失业长期性与社会负面效应愈加明显,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以及社会转型这一不确定因素,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代表,其青年失业问题的解决其面临的机遇远超挑战,而一些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潜力耗尽或社会动荡不安,青年就业问题更不容乐观。

关键词:全球性青年失业 大学生就业 跨国比较研究 NEET群体

一、缘起与文献回顾

国际劳工组织于2013年6月8日在总部日内瓦发布《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该报告通过详实的数据与例证,指出由于全球经济复苏速度缓慢,为年轻人创造的就业岗位很少,预计到2013年年底,全球15岁到24岁青年人中将有7340万人失业,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2.6%。目前青年失业数字已接近2009年经济危机顶峰时的数据(ILO,2013)。同时,该报告还以“风险的一代”(A generation at risk)作为副标题使得“青年就业”这一经济议题彰显了一丝风险社会学的意味,通读报告全文并综合分析比较该组织前期的类似研究成果,这次报告与先前的相比又能发现与以往不同的新问题与新的介入视角。青年就业问题尤其大学生就业问题历来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自2008金融危机以来,2013年是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比2012年增加19万人,达到历史最高的699万人。需就业人数和工作岗位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结构性挤压将何去何从?本研究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这部分“特殊”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给予深入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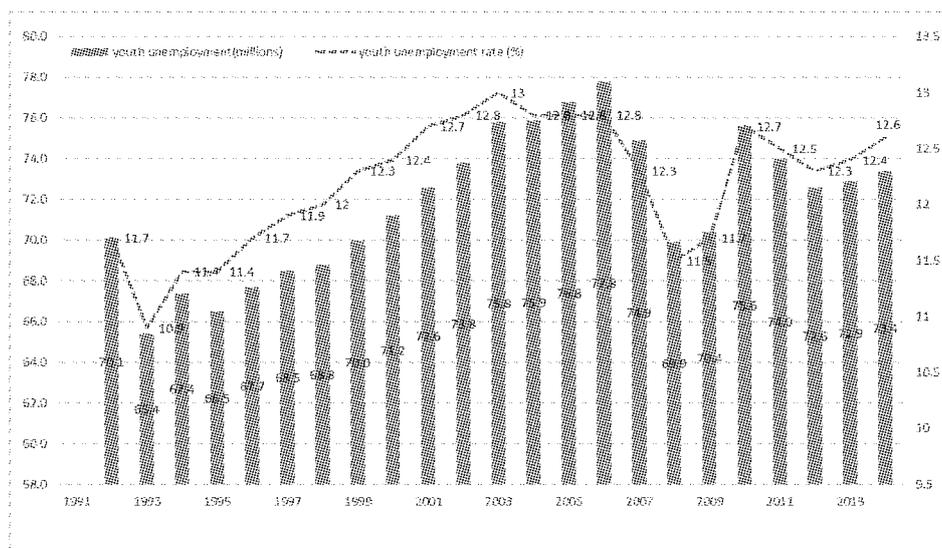
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引用率较高的同类研究多从以下几个视角介入:(1)中国青年失业现状与描述分析,此类研究伴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青年失业问题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李春玲(1997/1999)、吴森富(2003)、刘汶蓉和孙苑芳(2002)等人对我国青年失业状况、特征、失业成因及治理等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青年失业现象较为严峻,出现失业青年低龄化、高学历化等特征。(2)跨国比较研究,如毕先萍(2004)已经基于国际视角,也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分析了全球青年失业的总量和结构特征,其“认为青年失业具有明显的总量不稳定性及结构不均衡性,并从青年劳动力需求、供给、市场失灵等方面研究了青年失业的成因”。此类分析还包括徐章辉等(2005)对这份报告的解读,而王学俭、董振华(2006)则以欧洲发达国家的青年失业为主要对象,指出“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欧洲发达国家,也不得不面对为数众多且日渐增长的青年失业群体的困扰。”近十年已经过去,欧洲各发达国家在欧盟框架下,从调控青年劳动力的需求、供给和就业信息传导等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各国青年就业的压力,但此次报告的结论却给以上各类公共政策的乐观者“泼了一盆冷水”,欧洲多数国家的青年失业情况在过去十年非但没能好

转,甚至变得更为糟糕,这究竟是内因问题还是外因使然,本研究亦会进行深入的探讨;(3)关于青年就业的对策研究,此类研究汗牛充栋(毕先萍、徐章辉,2005;郝杰英、杨守建,2005;邵国明,2003;曾燕波,2005;修晶、李志刚,2006),综合来看,这类研究同质性较高,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策略、人口政策、加强就业保障体系以及各类公共就业计划着手,多数观点笔者认同,但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这会在后文进行相应的回应与探讨。整体来看,本研究按照逻辑顺序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新数据与新发现”通过对国家劳工组织及相关国际研究机构的报告数据进行详尽解读,探讨全球青年就业的新难点与新问题;其次,对中国大学生就业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未来青年就业的机遇与挑战;第三部分,通过定量模型分析,并以比较制度框架理论为基础,探讨未来青年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意义并进行反思。

二、新数据与新发现

(一)青年就业与经济景气周期高度相关

《2013 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称,由于全球经济复苏速度缓慢,到 2013 年年底,全球 15 岁到 24 岁青年人中将有 7340 万人失业,占全球该年龄段总人口的 12.6% (预测值),到 2018 年可达 12.8% (预测值)。自 2007 年至今,全球青年失业人口增加了 350 万人,目前青年失业数字已经接近了 2009 年经济危机顶峰时的数据(ILO,2013)。而过去二十年来全球青年失业人口与失业率变动情况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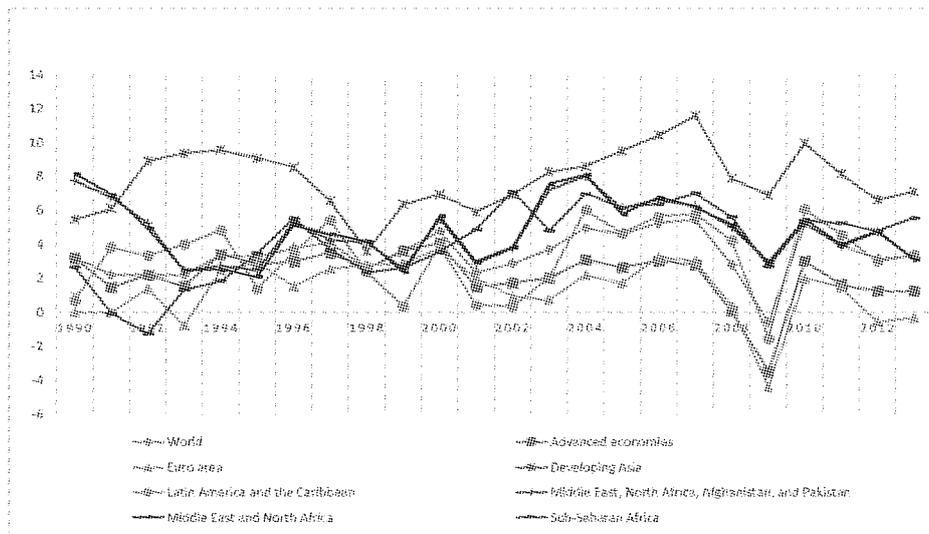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ILO: Trends Econometric Models, April 2013

图 1 全球青年失业人口与失业率变动情况(1991 - 2013)

众所周知,就业景气与否和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高度相关,这里不能不提到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典的“奥肯定律”——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为研究美国的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这一著名定律:GDP 增长比潜在 GDP 增长每快 2%,失业率下降 1 个百分点;GDP 增长比潜在 GDP 增长每慢 2%,失业率上升 1 个百分点,用公式表示即为:

$$\frac{Y - Y_t}{Y_t} = -a(u - u_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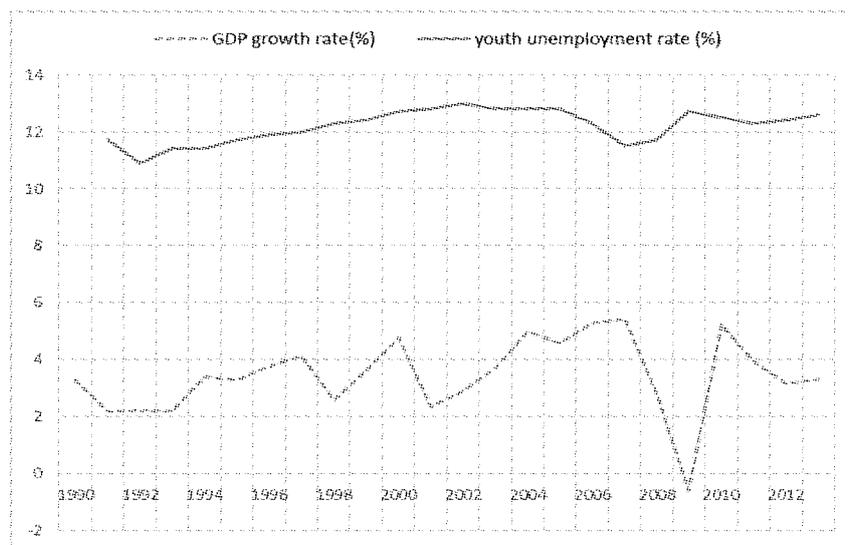
其中, u 为实际失业率,对应的实际 GDP 为 Y ; u_t 为自然失业率,对应的潜在 GDP 为 a ,代表的是失业率变动与实际 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系数,即奥肯系数。为了从实证角度考察全球青年失业情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下图 2 结合上图 1 来对比考察两者之间的实证关系,具体情况如下图 2 所示: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3

图2 全球各地经济增长变动情况(1991 - 2013) (单位:%)

首先,从上图2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全球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变动情况,不难发现全球经济增长愈加展示出同步性,即全球各地区增长水平与变动趋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步调愈加趋于一致,但是通过简单相关分析发现青年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两者的相关度不高(相关系数 $R = 0.11$),即表明,整体来看,全球青年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仅存在模糊的联系或者称之为“不确定性”联系,因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尤其是发达国家各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资源的需求程度,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对扩大就业的边际效用也带来了巨大转变,而这一实证结果是否能从社会政策角度解读为单纯经济增长对缓解青年失业问题几乎无效,则需放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宏观制度不同这一视域内进行研究。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3 & ILO: Trends Econometric Models, April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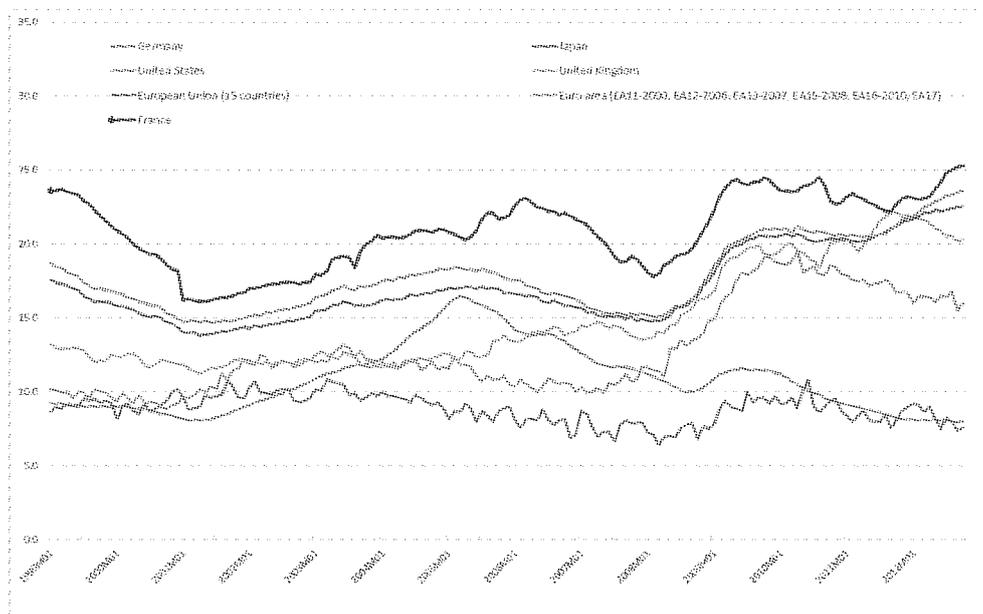
图3 全球经济增长率与青年失业率的相关关系(1991 - 2013) (单位:%)

又如图3所示,在1990-2005年间全球经济基本平稳增长的态势下,全球青年失业率仍一直处于攀升状态,而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将在下一节通过将其拆分不同的“区域类型”进行深入探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进入2005年之后两者关系变得愈加错综复杂,2005-2008年的全球景气周期带来青年失业率的快速下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剧烈动荡,使得青年失业率短时期内较大幅度攀升,而随后又因全球多数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与稳定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青年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是整体来看仍然在高位徘徊。

(二)全球青年失业的地域视角分析

从上一节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近二十年全球青年平均失业率高达12.2%,在失业率最低的年份也超过了10%。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全球经济相对景气的年份,青年失业情况的改善程度也不尽如人意,经济增长对青年就业的改善贡献不断降低。若要分析其中缘由,则必须通过区域分割视角将全球青年失业问题分为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两大板块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2013全球青年就业趋势》在第二章第一部分回顾了发达国家青年失业状况,对于青年失业问题,“受挤压”是这些高失业率国家中青年人口就业困难的真实写照,从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发达国家的失业情况呈现两个极端,欧洲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失业率较高,特别是进入2008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失业情况更加恶化,近些年来西班牙、希腊等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50%^①,引爆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问题;而另外一类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整体失业情况较为乐观,尤其是日本由于本身独特的劳动雇佣制度使其失业水平一直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内(10%以下),而美国与德国的充分就业政策也经受住了2008金融风暴的影响,最近五年来呈现失业率不断下降的态势,具体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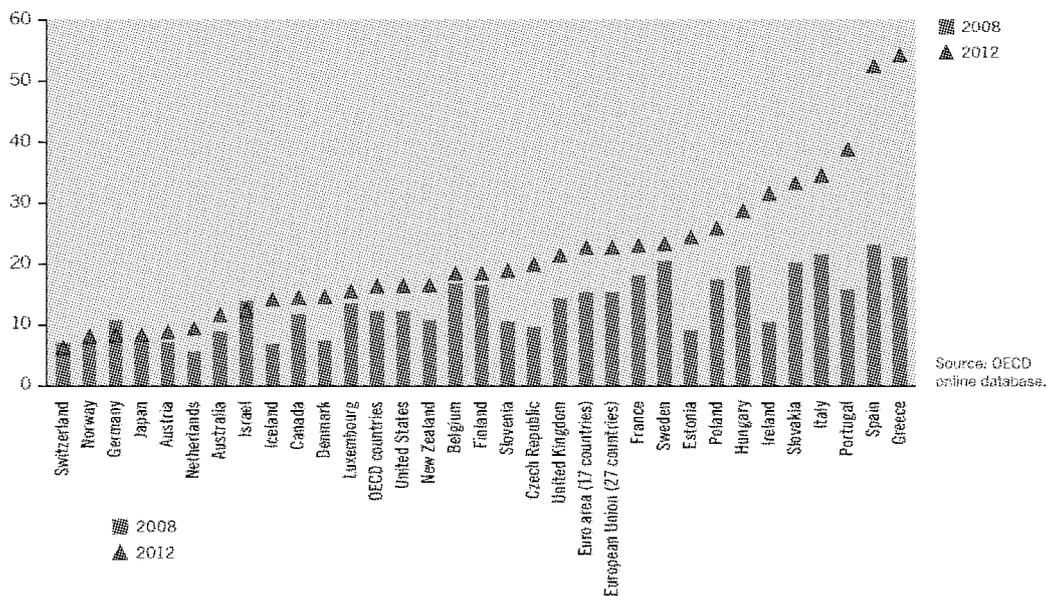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Eurostat;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

图4 若干西方发达经济体失业率的变动情况(1991-2012)

如图4所示,发达经济体内部失业情况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这也导致青年失业问题在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也大相径庭,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各国政府面对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采取了各种公共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提振就业市场信心,力图通过宽松的金融政策稳

^① <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

定经济增长,但过分依赖财政赤字与金融宽松作为扩大就业的手段对于不同国家其效果差异较大,一些国家通过财政与金融刺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青年就业压力,如瑞士、挪威、德国、日本这些国家,本身工业、产业基础较好,相关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青年失业率与2008年相比有小幅下降,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欧洲国家青年失业率继续飙升,如图5所示,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超过30%,一些国家甚至超过50%,反映出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状况极其严重(ILO,2013)。换言之,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模型都假设——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增长,而就业增长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在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是对于后工业化国家来看,这一理论假说必须进行相应的修正,随着新技术手段的不断应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得传统经济模型中劳动力变量的影响权重不断下降,这也使得不少发达经济体深陷失业困境,而青年群体由于更为缺乏就业市场需要的各种核心竞争力(技能、经验等),在这种“挤压效应”下,不少欧元区国家青年失业问题变得愈加严重。



资料来源: ILO: Trends Econometric Models, April 2013

图5 2008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经济体青年人口失业率的变动情况

如图4所示,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13年3月份欧洲的就业概况表明,欧元区17国失业率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2.1%;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年失业问题持续恶化,在欧元区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达24%。整体来看,欧盟地区除德国、瑞士、挪威等少数几个国家以外,青年就业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普通公众的想象。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国家出现大量的“NEET”群体^①——“既无工作又不在教育与培训体系中”的青年人口在持续攀升,在OECD国家中每6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人属于这类失业状态(OECD,2013)。而凯恩(Kahn,2010)的研究指出,在美国若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将会导致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下降6-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若一个社会长期存在青年人口就业困难会使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年轻时缺乏工作经验与相关历练会导致职业技能的匮乏,同时缺少收入会使得接受再教育与相关培训的可能性更低,更不容易在就业市场寻找到体面的工作(Decent work),而青年就业的问题难点即在对于体面工作的大量需求在现今的就业市场难以得到满足。

其次,该报告在第二章的第二部分又将发展中国家分为8个板块,主要介绍世界8个主要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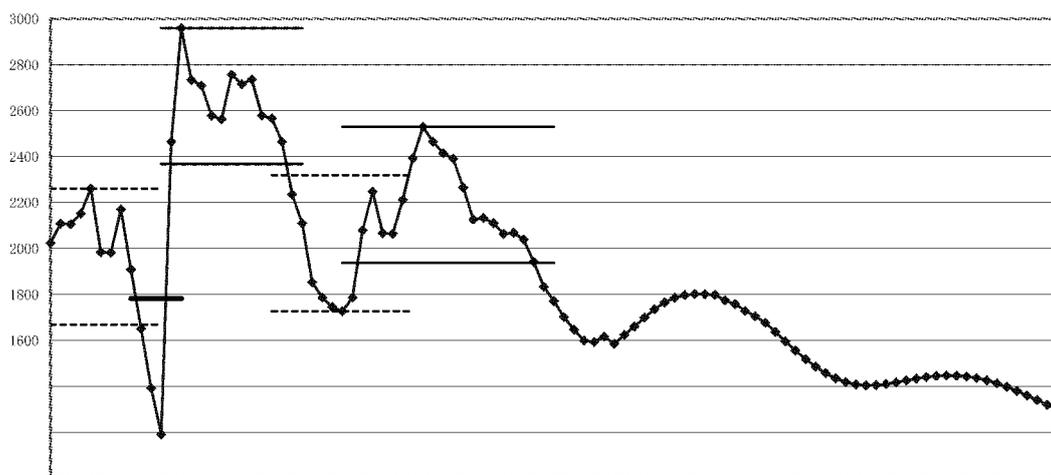
^① 在香港经常会被媒体当成宅男滥用,在美国被称为归巢族,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啃老族,在日本则被称为家里蹲(王斐帆,2013)。

中国家与地区(南亚、东亚、东南亚与太平洋、中欧与东南欧、拉美加勒比地区、中东、北非以及撒哈拉)青年就业情况,通过报告数据能够看到,中东地区作为全球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2012年青年失业率达到28.3%,预计2018年该数据将增加到30%;2012年北非的青年失业率也达到23.7%(ILO,2013)。这两个欠发达地区由于普遍的动荡政治环境与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全社会就业问题严重,另据国际劳工组织对利比里亚、柬埔寨、多哥和秘鲁等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发现15岁到24岁青年人中的2/3无业或从事收入微薄的非正式工作,也是失业率高企的“重灾区”。由于这些地区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国家经济建设根本无从谈起,出现大规模的青年失业现象不难理解。

简而言之,纵观整个报告,全球青年失业率最低的地方在东亚(9.5%)和南亚(9.3%)。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市场潜力较大,不像许多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增长潜力殆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需求萎缩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并没有像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在新世纪过去的10年间愈演愈烈;同时,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国内长期政治动荡,本国政府根本无心也无力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市场繁荣,青年就业问题也一直困难重重,而最近几年出现的“阿拉伯之春”等重大政治事件,其背后的主因之一就是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这一恶性循环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政治不稳定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又使得人民生活愈加困难,通过教育投入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越渺茫,陷入了更加糟糕的恶性循环。

(三)中国大学生就业与青年失业群体的相互关系

通过以上纵向与横向的对比,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青年失业问题一直普遍存在,即便考虑到官方“极低的登记失业率”与“极高的大学生就业率”本身可能存有质疑,但中国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与就业市场强劲的需求的推动下,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成功程度甚至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瞩目成就。而中国青年就业与大学生就业究竟是何种联系,笔者认为其紧迫性必须放在人口学的视角下进行框算与厘清,才能从社会风险视角进行深刻的解读。如图6与表1联合所示,我们不难注意到:在大学规模急剧扩张以及生育率水平不断走低的宏观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议题解决的好与坏在未来将会直接等同于应对青年人口就业问题成功抑或失败。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在上个世纪初的急剧扩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同一人口队列中的比例在不断攀升。



资料来源:联合国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6

图6 中国出生人口数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趋势预测

具体如表1所示,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速度在近5年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但是由于人口基数

走低以及跨国高等教育繁荣等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录取率在不断加速攀升,截至 2012 年,3/4 的高中毕业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图 6 所示,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每年总出生人口已经下降到 2000 万以下并快速下滑,而这部分人正好将在 20 岁左右接受高等教育,并在随后的 3-4 年内进入劳动力市场,按照这一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测,“未来 5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保持在年均 700 万左右,约占每年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且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再加上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城镇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士兵,总量近 1600 万人,我国青年就业压力巨大”(尹蔚民,2013)。面临未来就业市场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大学生就业问题将是青年就业的主战场之一。

表 1 历年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与录取率变动情况

时间(年)	参加高考人数(万人)	录取人数(万人)	录取率(%)
1996	241	97	40
1997	278	100	36
1998	320	108	34
1999	288	160	56
2000	375	221	59
2001	454	268	59
2002	510	320	63
2003	613	382	62
2004	729	447	61
2005	877	504	57
2006	950	546	57
2007	1010	566	56
2008	1050	599	57
2009	1020	629	62
2010	957	657	69
2011	933	675	72
2012	915	685	75

资料来源:国家教育部历年统计公报(2000-2012)。

三、跨国比较视角下的计量模型分析

(一)模型与数据

在分析跨国比较视野下青年失业率的影响因素之前,首先需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如何利用计量模型来实证分析这一问题。欧兰·亚士(Eran Yashiv, 2000)通过使用 VAR 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建模了外商直接投资、出口、GDP 和失业率的相互关系模型。从长远看他们的结论是“GDP 受出口变化的影响,但对失业率影响不大。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使得失业率下降”。而关于 GDP 的变化没能缓解失业状况这一点与本文前面的简单相关分析结论相似,即全球整体视角来看“失业与 GDP 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而莫瑞卡·卡罗纳索等人(Marika Karanassou et al., 2007)则从动态视角对劳动力市场中资本存量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使用的主要变量是利率和投资比例。通过直接估计资本存量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采用“就业链反应理论”(Employment Theory of Chain Response)得到的实证研究结论是资本存量可能是影响失业的关键因素。而亚历山大等人(Aleksander et al., 2009)基于微观视角发展了“搜索和讨价还价理论”(Search and Bargaining theory)框架,其计量研究则指出,长远来说货币供应量,利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在“低频率”呈正相关。而埃泽里和墨菲(Izraeli and Murphy, 2003)则研究了在 17 个州的失

业率和人均收入的产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更多元化的产业基础能保障较低的失业率。

关于失业率的计量模型汗牛充栋,这里不能一一回顾,而下面本研究则利用联合国(UN)的全球青年失业数据^①与IMF(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经济数据^②,进行简单的建模,其模型如下所示:

$$UR = \alpha_0 + \alpha_1 PF + \alpha_2 GDP + \alpha_3 INR + U_i$$

UR代表青年失业率,PF代表人口结构因子,反映其他年龄组人口对青年群体失业的挤压效应,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INR代表通胀水平,即资本存量效应。数据均采用2013年的最新数据。

(二)计量结果

表2 跨国视角下青年失业率与经济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I			模型 II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截距	11.481	9.186	.224	23.589	1.678	.000
青年失业人口与成年人口比	1.995	2.000	.329			
GDP 增长率	-1.207	.540	.036	-1.665	.515	.003
GDP(PPP)占全球经济的规模	-.810	.388	.048			
社会总投资占 GDP 的比例	-.103	.369	.782			
物价指数增长率	-2.785	.898	.005			

R = 0.740 (a) R² Adjusted = 0.429 P = 0.003 D. W = 2.269

如表2所示,模型I采用强制(enter)回归,模型II采用逐步(stepwise)回归法,在模型II中只有GDP增长率与青年失业率相关($P < 0.05$),考虑到模型I中更高的拟合系数 R^2 ($R_1 = 0.74 > R_2 = 0.521$),这里选择模型I进行相应的解释,从表2不难看出世界各国的青年失业率与GDP增长呈现负相关(GDP每增长1%,青年失业率下降1.2%);同时,也与经济总量有关,即经济规模更大的国家,其青年失业率相对较低($B = -0.81$),反映了经济的规模效应;最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水平负相关,但这种截面分析与“菲利普斯曲线效应”的内涵并不相同,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就发现了“菲利普斯曲线的陡峭型变形,反映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国家所具有的特点”(刘树成,1997)。而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两者之间关系日益复杂,已远超本文讨论的范畴,这里不再赘述。

(三)模型讨论

第一,从全球青年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似乎两者并不存在明显联系,但是通过跨国的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青年失业率高度相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青年失业率下降1.2%左右,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可能背后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全球范围内能提供给青年就业的岗位之间存在分层效应(hierarchical effect),即发达国家存在一类经济较好、失业情况较低的国家,也存在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严重的国家;同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这种结构性分层,如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繁荣与中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鲜明对比,而这种分层效应“一正一负”被整合为全球整体视角时,两者的关系变得模糊,因此会出现看似矛盾的两组结果,这也与截面数据(cross-section data)分析与时序数据(time-series data)分析固有的缺陷密不可分,但是囿于更多连续年份观测数据集的匮乏,暂时无法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来进一步探讨,亟待后续研究进行完善。

① 数据来源:联合国(<http://unstats.un.org/unsd/mdg/SeriesDetail.aspx?srid=630&crd=>)。

②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3/01/weodata/index.aspx>)。

第二,同时,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还显示,国家经济总量带来的规模优势可能会对青年就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除了实证方面的考量之外,从理论层面,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资本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高效率地区集中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发达国家中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与地区(如欧洲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最近10年面临的经济困境很可能就是这种资源向外转移(如新兴的金砖四国)的直接后果,面临不断萎缩的国内市场这些发达国家又不能像美国、德国、日本这种超大规模经济体有广阔的缓冲空间,反映了这些发达国家既无能力和新兴国家比拼生产成本,又不像美、日、德在全球竞争体系下拥有顶层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出现持续的经济不振与就业困难不难理解,而缺乏劳动技能与经验的青年人首当其冲,当然这些国家大量的非法移民也是青年失业群体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社会投资对青年就业的贡献并不显著,而以价格指数为指标的“资本存量”因素与失业情况似乎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联系。但是这一问题较为复杂,对此,笔者认为,从跨国比较视野来看,由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制度性”因素太过复杂,不宜用武断的理论假设对其进行简单化处理,比如说日本作为传统的经济大国,以“终身雇佣制”为特色的经济体制尽管在过去二十年有所变化,但是青年失业情况还是受到一系列传统因素的制约,在东亚很多地区,较为平和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机制使得青年就业问题总能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得到缓解;而对于中东、非洲的一些动乱之乡,通货膨胀数字往往不能用常理解,因此,这些变量影响因素不能作为理论建构的证据加以发挥,而必须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四、总结与相关思考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思考:

(一)跨国比较视野下,中国目前的青年失业现象好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统计资料中没能找到关于中国青年失业相关的统计数字^①。但宏观来看,全球青年失业率最低的地方在东亚和南亚。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市场潜力较大,在迈向工业化社会的进程中,劳动力需求总量较大,给大量的适龄青年提供了宝贵的工作岗位,而发达国家普遍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本身国内就业市场容量有限,同时,全球化更加恶化了本国的就业,正如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等认为的那样:“发达国家目前严重的失业状况在于经济全球化,理由之一,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商品的输入,给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冲击,等于是输入失业。认为北方工人的失业问题就与南北之间贸易量剧增和贸易构成的变化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竞争导致了北方的失业。理由之二,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等于是把本国的就业机会输往发展中国家。宣称,第一世界的资本现在只创造了第三世界的就业”(转引自,王传荣,2004)。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顺利承接全球化资本转移带来的工作岗位,因此,从最新的统计数据中我们还能看到拉美加勒比地区、中东、北非以及撒哈拉地区由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糟糕的基础设施条件、青年人口匮乏相应的教育与培训,并不能吸引国际资本发挥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因此,从比较制度视角下,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腾飞拥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尽管这一制度仍存“瑕疵”,但没人能否认,对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稳定且具有灵活性的“制度优势”是发挥比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

^① 令人遗憾的是,通篇报告中,只有中国香港与澳门的青年失业数据(中国香港与澳门地区的青年失业率为11%左右,ILO,2013),而对于国内青年失业状况的数据一直缺乏权威统计。事实上,较于国际通用的调查失业率,国家统计局一直以来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只是统计城市居民,未将农民工的就业情况算在内。而以登记失业率作为数量模型分析的材料其可靠性是极其容易受到质疑的,这也反映了“失业率”在国内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是,尽管缺乏权威统计,国内青年失业情况远好于世界平均水平符合基本的经验判断,这一点毋庸置疑。

(二) 比较制度视野下,未来全球青年充分就业将面临更多严峻挑战

从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来看,近二十年全球青年平均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包括在全球经济相对景气的年份,青年失业情况的改善程度也不尽如人意,西欧诸多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单纯的经济增长(极低水平)已经很难带来青年失业问题的缓解,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就业困境,尤其是消费萎缩、庞大的财政赤字与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对青年就业带来长期压力。

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笔者认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将会由“非常态现象”成为“常态现象”,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青年就业的改善贡献不断降低背后,反映的是传统经济发展范式在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不断走向式微。经济学家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所谓“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当经济增长环节的一个根本要素“人”被“效率提升”、“技术进步”所替代时,“就业问题”就从一个传统经济议题转变为社会议题。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增长潜力使用殆尽,而这些经济体所必需的“低人力成本”工作岗位可以外包给欠发达地区(包括大量非法移民从事本国国民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工作),而在其他生产部门,技术投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在不断摧毁工作岗位:“假设有一批制钉工人,他们辛勤工作,制造出了满足全世界需要的钉子。后来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使得制造钉子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些人一起工作原来一半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原来的产量,可是钉子的需要却没有增加。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只工作原来一半的时间,然后大家可以过上轻松的生活吗?残酷的事实恰恰相反,社会现实是让一半的工人下岗,然后让剩下来的人继续过度工作。”这套极端经济理性的运作逻辑在转型期的中国一再上演,甚至远比已进入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更为赤裸,因此,未来社会将会呈现这样一番景象:经济持续增长无需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效率代替充分就业需求,甚至某一天,我们会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悠闲颂》“In Praise of Idleness”中那样赞美闲适,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则告诉我们“未来的制造业将属于机器人时代”——如远近闻名的“富士康”——这个以“血汗工厂、员工跳楼”著称的代工企业早已开始大规模地用工业机器人替代成本越来越高的年轻劳动力,因此,随着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新的产业形态与社会发展,激发了青年群体对体面工作的强烈需求,但是这一诉求又与现代社会追求高效率、低成本的市场理性逻辑格格不入,这最终使得全球青年就业面临更多严峻挑战,而绝非乐观的信心满满。

(三) “NEET 群体”随着经济社会水平提高将会成为普遍现象,社会稳定与青年就业高度相关

“NEET”是舶来词,即上文提到的“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缩写,这一概念发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指即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在学校里上学,更没有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靠家人为生的青年人。这个群体一般指年龄在15-34岁、未婚、依靠父母或伴侣谋生的人。NEET族最早在发达国家和经济高增长、生活素质高的国家及地区的青年阶层中产生。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也开始催生一大批“富贵病青年”,使得“NEET”成为一种国际化现象。中国的NEET群体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还缺乏官方统计。但已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类:“一是学历低、技能不占优势的青年人,他们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岗位,可又嫌这类工作强度大、收入低,迟迟不愿就业,他们约占NEET的30%。二是高校毕业生,他们对就业岗位期望值过高,过于挑剔,导致处处碰壁,他们约占总人数的20%。三是年轻的下岗员工,这类人约占总人数的10%。四是以工作太紧张、不适应工作环境、人际关系不好以及希望再深造等理由自动离职的人,这些处于‘冬眠’状态的年轻人占到总人数的10%左右。五是满怀创业幻想的人,即使创业不成也不愿意给人打工,他们约占总人数的20%。最后一类人,不停地变换工作岗位,习惯性跳槽,最后一脚踏空,‘漂’落到社会上,他们也在总人数中占到10%”(张海峰,2006)。依据经验判断,在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这一群体的绝对数量不容小觑,但作为社会问题,其严重性却被掩盖,中国特殊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与发达国家与地区有极大不同,在“家长庇护”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前提下,其失业问题的解决难度将会远超西方发达国家。而从西方发

达国家“NEET”群体的发展历程来看,“NEET”群体作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始终与主流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极易因自我堕落、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而走入误区,不少“NEET”青年就走上吸毒、卖淫、偷窃、抢劫、自杀的自我毁灭道路,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青年失业问题绝非一个经济问题而更属于社会问题范畴。

除了青年群体的富贵病以外,随着社会进步新一代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就业期望值也更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在生产流水线上做重复劳动,而是期盼高收入、安稳且体面的理想工作岗位。但另一方面,失业率高的国家大多是在全球生产链上被挤出来的国家,这些国家或者工业生产部门逐渐消失,或者制造业惨遭淘汰,或者存留少量服务业,但就业质量不高、发展空间有限,无法满足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就业需求。与此同时,相比没受过教育的待业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待业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风险。美国著名社会学者福山在分析中东局势时就认为,这些局势动荡区的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并非最穷苦阶层,而是来自受教育的中产阶级,觉醒的政治意识让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即高教育层次的失业人口更容易让社会出现“断裂”,演变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威胁。

(四)未来五年大学生就业压力仍会增加,前景不容乐观

当前,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大学生史上最难就业季”与全球青年就业困难相互交织,从相关文献回顾,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贯穿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整个过程。长期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错位、高校学科设置缺乏特色、大学生自身定位失衡等矛盾,共同促成了“最难就业年”的诞生。苗国(2010)通过研究指出,“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处于扩大内需等各方面因素的考量,国内高等院校的招生数量在短短几年入学人数亦很快突破了百万,越过了就业市场所需的‘低位平衡点’,高等教育从此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普及教育”,这意味着“随着我国生育率的不断走低,每年人口增量呈现逐步走低的态势,但教育体系面对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动却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无力做出反应,大学生供给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就业问题。同时,大学生就业难更深层次的矛盾是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与人口数量、结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长远来看是否能够重建生产部门的信心、经济发展是否向好、经济结构转型是否成功来增强对适龄劳动力的整体吸纳能力,才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乃至全社会就业的压力的关键所在”。

笔者尽管基本认同以往研究中对青年就业扶助的各种政策,如经济结构调整、就业保障完善以及各种公共就业岗位扩张计划等,但难以认同的一类观点是“减少青年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提高供给质量,对解决青年失业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措施包括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出生率;进一步推广国家义务教育制度,完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青年受教育率和覆盖范围、提高劳动力质量等”(毕先萍,2004)。首先,关于减少人口就能促进就业这一议题,从欧洲国家的实践来看,持续走低的超低生育水平使得不少发达国家开始人口负增长,但是又如国家劳工组织最新报告数据显示的那样,这些国家经济停滞与就业萎靡并没有任何改观,甚至变得更为糟糕。理论上说,年轻人口既是消费人口更是生产人口,长期来看,年轻一代的竞争力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的青年人口规模固然与劳动力供给有关,但是有效的劳动力供需平衡要从本国的产业发展水平与层次的“拟合程度”来优化实践,笔者认为调整人口结构需要太长的周期,风险与不确定性较高,而经济发展转型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中短期就可以完成,因此,相关的人口政策的调整需提高决策的前瞻性,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在未来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从国民教育体系改革与人力资本开放的方略来看,无论哪个国家,其国民教育素质一定要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相适应、相匹配,人口素质低固然是问题,但人口素质高,超出了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大学生失业问题会因为高等教育的盲目扩张受到“市场”的惩罚,因为经济转型的方向决定了中国未来需要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前途将会更加光明。在国际视野中,

这样的“好榜样”显而易见,如上文提到的发达国家中一直能够保证极低青年失业率的德国、日本与瑞士,都是发达、先进的职业技能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德国的汽车工业、日本的精密仪器、瑞士的手表业都是高效职业培训体系与优势工业部门结合的典范,而中国未来的转型必须认真思考这一战略选择问题,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 毕先萍,2004,《青年失业的特征及成因:基于国际视角的考察》,《青年研究》第10期。
- 毕先萍、徐章辉,2005,《国外治理青年失业的政策及其启示》,《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
- 曾燕波,2005,《青年失业问题及其治理对策》,《青年研究》第1期。
- 李春玲,1997,《城镇青年的就业状态与职业结构》,《青年研究》第10期。
- ,1999,《1997-1998年中国青年基本状况》,《青年研究》第1期。
- 刘树成,1997,《论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管理世界》第6期。
- 刘汶蓉、孙苑芳,2002,《上海市2001年青年人才市场配置情况的调查报告》,《当代青年研究》第3期。
- 苗国,2010,《生育率下降背景下高等教育扩张与大学生就业困难——从“98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次贷金融危机”》,《人口与发展》第4期。
- 邵国明,2003,《欧盟各国治理青年失业问题的启示》,《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
- 王传荣,2004,《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失业观察》,《经济问题探索》第4期。
- 王斐帆,2013,《试论大众传媒中的NEET一族》,《今传媒》第2期。
- 王学俭、董振华,2006,《欧洲发达国家的青年就业政策及启示》,《当代青年研究》第3期。
- 吴森富,2003,《青年失业现象、原因及对策分析》,《青年研究》第1期。
- 郝杰英、杨守建,2005,《青年就业的问题和对策——基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 修晶、李志刚,2006,《国外促进青年创业的措施及对中国的启示》,《青年探索》第3期。
- 徐章辉、张明生、杨大伟,2005,《全球青年失业状况研究报告》,《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 尹蔚民,2013,《人社部:未来五年内地青年就业压力巨大》,《中国新闻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6-18/4937344.shtml>)。
- 张海峰,2006,《中国NEET群体就业问题分析》,《法制与社会》第18期。
- Aleksander Berentsen & Guido Menzio & Randall Wright 2011,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Long Ru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1.
- Eran Yashiv 2000, "The Determinants of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5).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employment-trends/youth/2013/lang-en/index.htm>).
- ILO 2013,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3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employment-trends/youth/2013/lang-en/index.htm>).
- Izraeli, O., and Murphy K. 2003,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diversity on state unemployment rate and per capita incom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37.
- Kahn, L. B 2010, "The long-term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n a bad economy", *Labour Economics*, Vol. 17, No. 2.
- Marika Karanassou, Hector Sala, and Pablo F. Salvador 2007,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Unemployment: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Unemployment: new insights on the Nordic, experience". *Economics review*. vol90 (5).
-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OECD Indicators, ([http://www.oecd.org/edu/skills-beyond-school/EDIF%202013--N%C2%B013%20\(eng\)-FINAL.pdf](http://www.oecd.org/edu/skills-beyond-school/EDIF%202013--N%C2%B013%20(eng)-FINAL.pdf)).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赵联飞